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載記第一
劉元海新興
祖以宗女為
烏珠留若鞮
今離石左國
助漢討平黃
蜀董卓之亂
維子豹為左
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
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
南鄙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
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
有一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父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
怪夢且所見魚變為之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研究

主 编 瞿林东

副主编 董文武 罗炳良

晉書一百一

丁和 劉宣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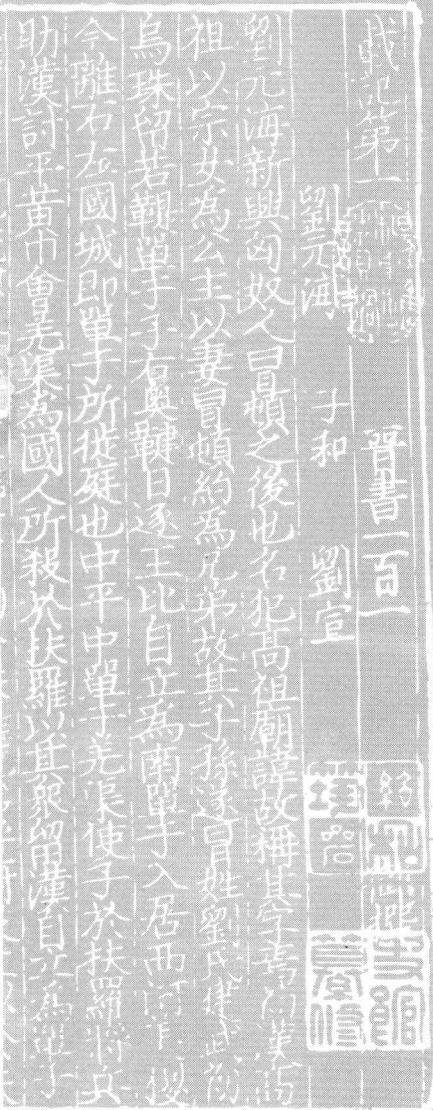
主 编 瞿林东

副主编 董文武 罗炳良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瞿林东主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3

ISBN 978 - 7 - 5013 - 1840 - 7

I. 中… II. 瞿… III. 少数民族—民族史学—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196 号

书名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著者 瞿林东 主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火炬印务(北京)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25

版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5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1840 - 7/K · 1605

定价 59.00元

目 录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代序)	瞿林东(1)
论夷夏与一统	葛志毅(7)
略论先秦时期华夷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邱 锋(29)
双重视野透视下的岭南先秦民族文化的多元特征——以考古发现和 文献资料的结合为例	陈国保(43)
略论应劭的民族观	周景勇 刘文英(60)
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	瞿林东(68)
魏晋南北朝史家的民族编撰观、夷夏观	董文武 王尔春(111)
《魏书·序纪》的史学意义	李传印 陈得瑗(120)
邓渊《国记》考释	汪受宽 唐如明(130)
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从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的角度考察	李鸿宾(144)
突厥民族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思想——以“噉欲谷碑”、“阙特勤碑”、“苾伽 可汗碑”为探讨中心	朱振宏(155)
回鹘文文献与古代维吾尔史的构建	杨富学 赵天英(176)
西夏史研究与文献整理——一个民族史学工作者的自述	李范文(195)
《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舒习龙(210)
《辽兴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韩府君墓志铭》的史学价值	刘建国 罗炳良(218)
辽金元时期的经史翻译及其意义	吴凤霞(225)
从元朝的设馆修史看蒙古族史学	王 雄(234)
西南彝族史学述要	东人达(260)
《汉藏史集》的史学世界	王 璞(276)

2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	孙 林(285)
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	乔治忠 崔 岩(304)
清代史馆修史与民族观念	王记录(314)
略论近代以来的民族史撰述	张 越(325)
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料学的贡献	赵梅春(334)
古代治理边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想	方 铁(346)
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周 琼(358)
论“汉化”并非都意味着进步	温玉春 贺军妙(368)
鲜虞中山国民族服饰特色研究	何艳杰(376)
中山国青铜器的北方民族特色浅析	曹迎春(384)
关于河北回族自治县的历史与思考	张同乐 苏文珠(388)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代序）^{*}

瞿林东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我们一方面要作大量的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这是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整体面貌，这是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全局。它们的关系是：脱离了具体的研究，无以谈论全局；没有全局和全局观念，具体的研究也难得有进一步提高。

关于全局，至少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怎样界定“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第二，怎样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总相？就这两个方面问题，我讲一点自己的肤浅认识，向同行们请教。

先说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怎样界定“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里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这些记述，不论其作者出身于何种民族，不论其采用何种文字、何种体裁，也不论其所作是专书、专篇或专书中的某些部分，包括作者의思想和撰述活动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内，设立了译书所，用以翻译汉文经书和史书，这种翻译史书的活动，也应视为少数民族史学活动。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史学中始终存在着撰写少数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因而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这同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

^{*} 2007年9月20日~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主办，承德市文物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承德举行，本文系研讨会主题发言之一。

2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息息相关。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了民族“平等”的思想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观念，孔、孟的民族观有所不同，马、班的民族观也有所不同^①。但这种不同，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史学家们关于多民族历史的记述，同时也没有从根本上阻止史学家们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这就是中国史学中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的历史原因。

第二，怎样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点？

这是我们要着重探讨的一个新问题。我认为，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致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

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传统，至迟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春秋》和《左传》等书，它们清晰地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多民族的存在和春秋时期中原的“诸华”、“诸夏”同周边的戎、狄、蛮、夷不断交往、冲突、融合的历史^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一书不只是记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同各诸侯国的历史，而且也记述了“诸华”、“诸夏”同戎、狄、蛮、夷各族的关系史。清代学者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其中的《四裔表》就是从《左传》等书中勾稽出了春秋时期戎、狄、蛮、夷的历史。

两汉时期，《史记》、《汉书》都包含了较多数量的少数民族历史专篇。举《史记》为例，白寿彝先生这样指出：“《史记》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③

① 参见白寿彝：《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14。

② 参见瞿林东：《略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

③ 白寿彝：《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页6~7。

班固的民族观比之于司马迁要落后一些，但他还是在《汉书》中撰写了少数民族历史专篇，即《匈奴传》上下、《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上下。《史记》、《汉书》为少数民族立传，一方面写出了有关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写出了这些民族同中原皇朝的联系，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结合。此后，历代“正史”大多模仿《史记》、《汉书》的作法，从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撰写少数民族史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史记》、《汉书》的上述作法，乃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滥觞。

第二阶段，是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多途发展局面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发展概况，可以从《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和《新唐书·艺文志二》“伪史类”的著录而得其大体。这时期面世的十三部“正史”中的十一部“正史”，都有少数民族史的专篇；而这十三部“正史”中的《魏书》、《周书》本身就是皇朝史与民族史的结合，《北史》则是几个朝代通代的皇朝史和民族史的结合。这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少数民族史学遗产。《华阳国志》作为较早的地方史撰述，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史的面貌，弥足珍贵。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要著作，可惜久已散佚；其所著《十六国春秋纂录》一书，有《汉魏丛书》本，前人疑者有之，信者亦有之，这里依清人汤球之说，信而存之，并可以其与《晋书·载记》作对比性阐述，以揭示这两部少数民族史的面貌和异同。杜佑《通典·边防典》实质上是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①，其所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族的分布、族源、历史、风俗以及与中原皇朝的关系，条分缕析，灿然可观；尤为难得的，是杜佑的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这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最先进的民族思想。晚唐面世的《蛮书》（亦称《云南记》）是一部反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专书，含有丰富的民族史内容，也展示出一部民族史应有的规模。这期间还有一些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一些重要事件，如北魏崔浩国史案，北魏宗室元晖主持撰集《科录》，隋朝魏澹著《魏书》、裴矩著《西域图记》，唐初李延寿所著《北史》的少数民族史特色，盛唐时期张大素、元行冲先后撰成的《后魏书》和《魏典》等，说明魏晋隋唐间的北朝史或北朝史所具有的少数民族史学

^① 《通典》的九典之中，《兵典》不记兵制而叙用兵方略，被宋人称为是兵家之书。《边防典》不记制度而叙少数民族的历史，同《兵典》相类似，而又各有其旨，反映了作者的深意，即中唐用兵的重要和民族关系的重要。

4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特征,始终受到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史学此时已开始产生,汉文典籍《史记》、《尚书》、《战国策》、《礼记》、《左传》、《毛诗》、《文选》等相继传入吐蕃,有的已有藏文译本,所有这些,对藏族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以上简要论述,粗略地反映出魏晋隋唐间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盛况。

第三阶段,是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深入发展的趋势。

深入发展趋势的标志,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发明及有关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出现,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等,有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并得以流传下来,如西夏黑水城文献、《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红史》等。其次是少数民族史与少数民族贵族所建皇朝史的进一步结合,这突出反映在辽、金、元三朝的实录和国史的撰写。再次,是辽、金、元三朝均有译书机构,把大量的汉文文献译成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其中不乏历史著作,如“十七史”、《贞观政要》、《通历》、《资治通鉴》等,这也是少数民族史学的一部分,它们对促进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其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态势。

这种态势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方志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这在全国总志和众多的地方志中均有突出反映。二是清代方略体史书的出现,这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活动的历史记载,其中包含了不少少数民族史的内容。三是明清两朝的实录部帙浩繁且都流传至今,其中也有丰富的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面貌的记载。四是清代学者对辽、金、元史作了许多补撰和研究;而这一时期藏族史学在史书体裁、史书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都有了重要的发展^②。

第五阶段,是中国近代(1840~1949年)的少数民族史学,其特点是在少数民族史研究和撰述中,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的不断提升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发展。

上述特点,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等等,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世界书

^{①②} 王尧:《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局，1934年）、马稻武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上海民众书局，1942年）、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上海光华出版社，1948年）等书，关于中华民族及其多民族组合的研究，都有充分的反映。这时期的民族意识、民族危机意识、中华民族的观念等，都同近代国家观念、疆域观念相联系，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系。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开宗明义，对“中华民族”作了这样的论述，他写道：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①

这些论述，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认识的最集中、最科学的概括。

第六阶段，是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阶段。

所谓“新阶段”的“新”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民族史和少数民族史学，这是历史观上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其所得资料在二亿字左右，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此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也是中国历史上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622、623。

6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前的。这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史专著，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新阶段。

我们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问题，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遗志，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早在1986年，白寿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提出了研究少数民族史学的任务，并强调了这一任务的特殊重要性。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中国史学有注重多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的传统，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优良传统的认识。

第二，中国史学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史学史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

第三，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从史学发展上和历史文化认同的客观趋势上阐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意义，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从而推进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这一研究领域有多种途径和广阔的前景：比如关于这方面的汉文文献资料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的研究；又比如可以从文献学入手研究，也可以从史学史入手研究；其研究所得可以撰写成考证性的论文，也可以撰述论述性的论文，还可以写成学术专书等等，因此我们说它有多种途径和广阔前景。当然，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应当具有全局意识和历史主义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度自觉的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观念。

论夷夏与一统

葛志毅

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相关，大一统观念也产生很早，无疑这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与之相对，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亦出现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孟子所谓：“闻用夏变夷，不闻变于夷也。”因此前人往往认为夷夏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不利于民族的团结统一等等，所予评价不高。我觉得，不应囿于夷夏这些历史上的传统文化术语而有所顾忌，应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夷夏论实相当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大一统局面树立起民族融合的文化主导核心，而缺乏文化主导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是难以维系与巩固的。同时，夷夏论又与大一统在相互为用关系中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总之，为加深对中华民族发展中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之理解，必须关注夷夏论的深层意义内涵。更主要的，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文化的看重，并培植起以文化立国的意识。可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文化的设计者力图把对主体文化的追求与维护，植根于每个成员的心目中，以维护这个文化主体的巩固与永存。所以又可以说，中华民族真正是一个文化民族。

一、《公羊传》的大一统理想

中国古代很早就流传“海内”、“天下”之类的概念，其实这代表了一统理想在语言概念上的反映。因为这实际上就相当于视中国大地为一个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于是从地理信念上为一统局面的形成，提供了认识根据。秦统一之后，就是以此观念为据描述了天下为一的局面，《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琅琊台刻石》中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

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里不仅指明当时人所知晓的地理四至，而且还使用“人迹所至”、“泽及牛马”、“莫不受德”这些最大化追求的概念，描述此无外、无限的一统之局，从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国家地理认识方式：天下无外，四海为一。与此一统局面相应的有帝王一类统治名号，《逸周书·大子晋》：“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新书·威不信》曰：“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就是说天子与帝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天下一统的象征，从文献上看，虞夏商周以来已经使用了帝及天子之类的称号。如果从直接的语言形式上看，大一统概念较早出现于《公羊传》，其隐公元年在解释“元年春王正月”时有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家最看重“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因为它是王权一统在历法正朔和历史纪年形式上的标志。从思想观念上看，一统思想也是《公羊传》政治理论的一个主题，其具体表现即它对一统局面的赞同与追求之深切。在《公羊传》看来，天下有王，乃是一统局面的理想形式；天下无王，则退而求其次，即依靠某种现实的权威维系起一统的秩序，使一统局面在一种变通的形式中得到实现。如《公羊传》往往以“实与而文不与”的委婉形式，对诸侯的一些僭越行为加以宽容默许。其背后的原因，即是对一统局面的深切追求心理。用儒家的语言来表达，即王道既不可得则退而求其霸道。如《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王者欲一乎天下。”文公十三年：“欲天下一乎周也。”就是说，《公羊传》主张由王者一统天下，具体讲即周室一统。《公羊传》又屡言“王者无外”^①，即其主张天下之大，无不在周王的一统范围内。《公羊传》的主导思想之一是尊王，因此每对诸侯卿大夫的名分权力予以约束限制，如主张“诸侯之义不得专讨”，“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等^②。这实际是以约束贬抑诸侯卿大夫的形式，维护周天子的权威，从而也就是维护周室一统的局面。但《公羊传》对诸侯卿大夫的贬抑约束往往只成为纸上虚文，并不得不对诸侯膨胀的现实权力表示默许容忍。如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何为贬？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

① 分别见《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

② 分别见《公羊传》宣公十一年、僖公元年、文公十四年。

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① 按其所言乃明确表示，在天下无王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现实的诸侯霸主来维系起一统的等级秩序。这既表现出《公羊传》作者不得已的苦衷，也清楚表明其对大一统局面追求的深切。本来儒家对霸道是不赞成的，因而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②《荀子·仲尼篇》亦谓：“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如果说《公羊传》在这里为大一统而不得不降格求于霸道，乃表现出的违经求权的不得已，那么，更有甚者，即为求得表面的一统局面，几至冒犯严夷夏之防的大忌。如《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人所熟知，严夷夏之别是《公羊传》的又一主导思想，但此处所言显然有违其义。这里的意思是讲，只要天下诸侯能全部与会，即使是被称为夷狄的吴为霸主主会也可以。这样，为追求表面的一统，《公羊传》可以由王道退至霸道，甚而可再退至以夷狄为霸主。那么，《公羊传》作者对一统局面追求的深切之情，至此无需乎多言了。同时也应看到，大一统与严夷夏之别在《公羊传》里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只要为了大一统的需要，夷夏之别也是可以变通的。换言之，夷夏之别对大一统仅处于附从的地位，唯大一统才是绝对的原则。二者本不矛盾。

《公羊传》所极力推崇的大一统观念，不仅对后世留下深远影响，而且很快在秦汉时的政治家与学者们言论中有所反映。秦代的李斯等朝廷大臣就不止一次在上奏中言及一统，如李斯初见秦王，就曾说过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大计^③。继在汉初儒家著述中涉及更多，如陆贾《新语·怀虑篇》：“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伏生《尚书大传》：“周公一统天下，合和四海。”^④《公羊传》的一统说在汉初儒家传承下来，并进一步得到发扬。董仲舒不仅在

① 《荀子·正论》：“圣王没，有势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所论可与此《公羊》宣公十一年传文相校。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③ 《史记·李斯传》，其与秦廷大臣言及一统者，又见《秦始皇本纪》。

④ 《文选》卷三七曹子建《求自试表》李善注引。

其著述中使用一统的概念^①，而且还在对策中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对策使大一统概念进一步扩大影响，如司马迁受学董仲舒，在《史记》中多处出现一统的概念^②，汉武帝则在元朔六年六月诏书中有曰：“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③其他如汉廷大臣路温舒、王吉、匡衡等也都在上疏中各自推阐《春秋》大一统之义^④。总之，与西汉的国力相应，自武帝以后《春秋》大一统之义得到极大宏扬，并由此深入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之中。虽然我们可据文献记载指出大一统概念从《公羊传》直至西汉时代的一贯传衍，但绝不能因此说其内涵意义也一贯未变。由于《公羊传》在先秦时期即已由孔门后学、儒家经师们口说流传，因而其所谓大一统概念所依托的历史背景是西周分封制。而李斯与秦廷大臣们所言大一统已与郡县制联系起来，即所谓“一统皆为郡县”，“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⑤。而分封制下的大一统与郡县制下的大一统，在政治乃至文化上的结构是大相径庭的，这就使《公羊传》大一统与秦汉继起的大一统在概念上大异其趣。秦汉时代的郡县制，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为深入紧密，权力结构更为强化集中，并因此真正建立起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与此相异，《公羊传》的政治格局完全以西周分封制为原型。在分封制下，由于天子、诸侯分立，政治局面不集中，诸侯相对于天子有较大独立性，因而出现“诸侯专一国之政”^⑥的现象，因此根本无法形成如秦汉那种真正政治意义的一统局面。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仍只能认为，其时不过处于文化理想上的大一统追求。先秦时代的社会观念不同于秦汉时代，如《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孔颖达曰：“礼，天子封诸侯以国，诸侯赐大夫以族。天子不灭国，诸侯不灭族，有小罪则废其身，择立次贤，使绍其先世。《论语》云：‘兴灭国，继绝世。’谓此也。必有大罪，乃得灭之。”^⑦是天子一般不讨灭诸侯，诸侯更无权灭诸侯。春秋时楚因陈夏征舒杀其君而出兵灭陈，后因其大臣认为不妥而劝谏楚君，楚君于是复封陈国^⑧。由于楚复封陈之举合于“兴灭国，继绝世”

① 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统于天下”。

② 如《秦始皇本纪》、《李斯传》、《秦楚之际月表》、《太史公自序》等。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分别见《汉书》本传。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考工记·匠人》郑注。

⑦ 《左传正义》卷三十五。

⑧ 《左传》宣公十一年。

之义，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①。与此观念相关，三代战争以仁为本，以德服人，一般不主张灭国而是“服而舍之”。如《司马法·仁本》载：“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无取禾黍，无取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所言完全是吊民伐罪的王者仁义之师，不以兼灭人国为目的。这种战争指导思想正与“兴灭国，继绝世”的信念相符。直至春秋时还提倡：“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以德、刑相辅，正是周初以来的观念。《礼记·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证明其观念至少尚流行于春秋时代，又《荀子·王制》：“彼霸者……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所以亲亲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战国时还保存了这种观念，故齐攻取燕，孟子对齐宣王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②即劝齐王复燕。《荀子·仲尼》谓齐桓公“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是行事险污，不足以称于君子之门。这种反对灭人之国的信念在《公羊传》中亦有反映，如隐公二年“疾始灭”，隐公四年“疾始取邑”，皆可为证。这实际是在维护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分封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在此信念的主导下，只能维系天子、诸侯间的分立局面。但若从礼制角度讲，这就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统，周礼分封制下的一统。但若从后来专制集中的政治制度方面讲，由于分封制还无法建立起能贯彻政治一统的严密机制，因而不得不借助文化观念上的一统象征，以礼制上的合和弥缝政治上的松散，如周代经常借助各种礼仪演习深入贯输尊王思想即为此。春秋时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此尊王思想在霸主维持下的继续。君天子、臣诸侯乃是分封制下借周礼信念维系起来的文化一统局面，但礼制文化一统与政治机制一统是有距离的。荀子曾对战国郡县制下的领土格局与周代分封制下的领土格局进行比较。《荀子·强国》：“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有）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

① 《史记·陈杞世家》、《孔子家语·好生》。

② 《孟子·梁惠王下》。

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是古代天子直接统治所及不过王畿千里之内，战国时秦越出本土占领他国领土而兼有之，因设置郡县，使统治所及超出邦域而遍于天下。因此郡县制的一统超越分封制的局限而使统治直接深入到底，所以天子领土不再有封内畿外之别而融合为一。由分封制决定的前述政治格局，乃是《公羊传》在阐述大一统概念时所熟知的历史背景。由于其时尚不具备秦汉式的政治大一统背景，因此《公羊传》所谓大一统，只能主要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大一统。汉代王吉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①所言即是从文化上去理解大一统的意义，也最得《公羊传》大一统概念的本义。周代分封制下的政治分裂空隙，完全是靠诸夏诸侯在文化上的认同感情弥缝起来的，如《荀子·正论》所言“诸夏之国同服同仪”，杨倞注：“仪谓风俗也，诸夏迫近京师，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仪也。”周王主要是基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来发布政令，会同诸侯，维系起周室控制下的一统局面。这是我们在理解《公羊传》大一统概念时必须具有的基本认识。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出现颇早，因此也很早就形成建立在文化同化观念之上的“天下国”意识，《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根据一些文献记载，认为自五帝以来声教德化就已经远及于天下四海。如《书·益稷》载禹对舜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这是说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尽为臣仆，因而使声教远播四极。这无疑是以大一统的眼光描述舜禹时代。《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时“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帝喾“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帝尧时“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禹时“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这同样是以大一统的眼光描述五帝时代。但五帝时的势力影响还不足以达到“日月所照”、“舟车所至”的广大范围，对五帝时代的大一统描述显然具有过分理想化而导致的夸大倾向。但这亦非全无根据。因为从记载上看，至少在尧舜禹时代已形成部落联盟的统一组织，虞夏商周四族的先人即舜禹稷契共处于此统一组织之中。继则以河东、河内、河南所谓三河地区为中心夏商周三代又相继建都于河洛，形成当时的中国与诸夏格局，由是形成后来所谓三代文化间的因革损益关系，联带产生文化理念上的中国一统信仰，也才出现上述五

^① 《汉书·王吉传》。